

辛口村调查

——关于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探讨

李哲夫 杨心恒

据预测,到公元2000年中国农村劳动人口将达到45 000万,农业能够吸收的最多只有一半,其余的一半约22000多万劳动人口要靠发展第二、三类产业来解决。目前中国的主要城市无论是住房、交通、服务以及其他发展条件都呈饱和状态,压力甚大,无力再吸收如此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主要依靠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发展非农产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因此,研究当前中国农村改革以及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不仅对于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农村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84年,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曾经对上、中、下3个辛口村作过一次基本的家户普查。在这个基础上,1986年初,我们又对辛口3村作了较系统周密的家户普查及劳动力抽样调查。调查回收家户问卷810份,劳动力问卷1354份,村委报表3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全部为有效样本。

一、辛口村1978—1985年生产力的变化

辛口村是上辛口、中辛口、下辛口3村的总称,地处天津市西郊南运河西岸,距市区约20公里。原来这3个村之间有道路与农田相隔,如今住宅已连成一片,但仍按3个行政村分别管理。

1978年以前,这3个村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在农业中又以种植粮田为主,除了上辛口村办了一个电镀厂之外,其余两村尚未有固定的村办工厂。1978年人均分配水平上辛口村为199元,中辛口村156元,下辛口村180元,3村之间相差不多。1978年以后,由于经营及产业结构上的变化,3村的人均收入水平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从人均收入分配水平来看,3村在1978年的差距不大,但农村改革以后差距逐渐拉开。上辛口村在1978—1982年间以152%的速度增长,率先起飞,下辛口村同时也以88%的增长率跟进,只有中辛口村发展速度较慢,增长率为24%。可是从1982年以后至1985年间,中辛口村的人均收入以149%、下辛口村以108%的增长率腾飞,而上辛口村也仍然能够维持64%的增长率。1985年实际分配金额,上辛口村仍居第一,为822元,几乎是中辛口村的两倍(中辛口村、下辛口村为481元和704元)。

人均收入分配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所以我们再来考察3村的工农业总产值以及人均产值(见表1)。与天津市西郊区的人均产值比较,上、下两辛口村都占优势,特别是上辛口村,它的人均产值已是西郊区人均产值的两倍多,只有中辛口村在全区平均水平线上。再从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上看,上下两辛口村与西郊区一样,都有80%以上的工业产值,只有中辛口村偏低,低于全区的比重。除此之外,3村的公共积累也有相当的差距。1985年,上辛口村的固定资产(用于生产的不动产,不含土地)为258.8万元,中辛口村为92.9万元,下辛口村为90.8万元,上辛口村是其余两村的2.8倍,若按人均固定资产计

算,上辛口、中辛口、下辛口3村分别为2423元、615元和1690元,上辛口村是中辛口村的3.9倍和下辛口村的1.4倍。

以上3村的差异,发生于1978年以后的5、6年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该村的人口、土地及劳动力状况。

表1 辛口村1985年工农业产值之比较

地区 项目	上辛口	中辛口	下辛口	西郊区	天津郊区
工农业总产值(百万元)	5.1	3.5	2.0	490	6,498
农业产值(%)	14.7	35.3	19.8	16.2	31.5
工业产值(%)	85.3	64.7	80.2	83.8	68.5
人口数	1,068	1,511	520	211,099	3,951,238
人均总产值(元)	5,083	2,336	3,788	2,325	1,089

资料来源:根据村委会报告和天津市统计局资料编制。

二、辛口村的人口、土地及农业剩余劳动力

我们首先把3村的人口结构联系土地及其他农业资源做对比分析。辛口3村的人口性别、年龄及文化构成基本上无大差别。3村总合起来,15岁以下的人口占27%,60岁以上的占8%,这与天津市西郊区1985年的相应数字25.3%和7.4%相差不多。年龄中值为24.3岁。文化水平集中在小学及初中,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占41.5%;初中占31%;文盲仍有相当的比重,每5个人中就有1人是文盲;大专毕业生极少,3村总共只有4人。

在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上,3村之间也没有多少差异。但与全国农村及天津市郊区农村比较则有明显差异。辛口3村户均人口为3.82人,全国农村1985年户均人口为4.49人,天津市郊区农村1985年户均人口为4.13人。3村的家庭规模与天津市区的家庭规模(3.71人)相差不多。辛口3村的家庭有80%是2代人的核心家庭。这个比重不但高于其他农村地区,甚至高于天津市的67.64%(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因此该村每户劳动力也以2人居多,60%左右的家庭是以年轻夫妇2人为主要劳动力。

3村当中,中辛口村人口最多,为1511人,劳动力的比重也最高,占67.3%,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1.28亩,为3村中最低者。上、下两辛口村的人口分别为1068人和520人,劳动力在全村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54.3%和44.4%,都低于中辛口村,^①而人均耕地相对较高,分别为1.82亩及1.42亩。作为农业基本资源的土地,中辛口村相对较少。至于对农田的使用,上辛口村经济作物已占相当的比重,林果面积有913亩,几近全部耕地的一半。中辛口村以及下辛口村则在种植蔬菜方面较为注重,都占全部耕地的1/3左右。我们在调查访问中获悉,上辛口村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承包到户,现在已全部收回由集体经营,而中、下两村则全部承包到户,直到如今。经营单位和方式不同是由各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我们测算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是根据各类农田每亩所需标准劳动工日和男女劳力平均每

^① 这不是由于人口的年龄结构造成的,而是与学龄人口的就学状况有关,有待专门分析。

年出勤天数计算的。园田每亩用工126.5日，其他均比照粮田用工，按18.5日计算，男劳力每年出勤320天，女劳力出勤280天，我们按平均300天计算，这样我们设计的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为：

$$SLA = \frac{LABOUR(300) - \Sigma(S_x \cdot F_x)}{300}$$

根据以上公式我们测得上辛口村农业所需劳动力为233人，剩余347人，占全部劳力的59.8%；中辛口村农业所需劳动力404人，剩余613人，占全村劳动力的60.3%；下辛口村农业所需劳力136人，剩余95人，占全村劳力的41.1%。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上，3村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为潜在剩余劳动力。这些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何在？他们目前的状况如何？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辛口村生产力变化的原因

从表1可以看出，辛口3村的非农业产值已占相当的比重。那么这样高的产值是由多少劳动力创造的呢？亦即农村工业吸收了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呢？其次，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否会使农户收入逐渐脱离对农业的依赖呢？再次，3村发展的不同是否与他们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集体和农户的生产再投资的情况有关呢？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因素来探讨3村在1985年发展水平不同的原因，就是本节的目的。

1. 农村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及农户收入结构。根据表1和表2的资料，我们测算出上、中、下3辛口村每个工业劳动力全年所创造的产值，分别是每个农业劳动力所创产值的228%，627%和374%，这说明哪个村的工业吸收劳动力越多，则这个村的经济越发达。从表2可以看出，上辛口村的工业劳动力已占全村劳动的71.7%，这比表2测算的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59.8%）还要高出11.9%，实际上这个村的工业不但把本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纳入，而且从外村吸收100人。同样，下辛口村的工业劳动力的比重（51.9%）也超出测算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重（41.1%），工业多吸收了10.8%的农业劳动力。只有中辛口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22.6%）还远远不能把60.3%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联系工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大大超过农业的事实，可见上辛口村发展最快，下辛口村次之，中辛口村还欠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农村工业中去，主要发生在1980年实行农村改革之后。差不多有3/4的非农业劳动力是在1980年以后转业的，尤其是上辛口村，87.19%的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转入的。相对于上辛口村来说，中、下两村在1980年以前转业的比例要高一些，分别为44.1%和29%，而那时这两个村并无稳定的村办工厂，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潜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压力太大造成的。如前所述，中、下两村人均耕地较少，1980年以前若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则用工较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就会很大。

表3所列的劳动力兼工情况，可进一步说明各村劳动力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辛口村的劳动力样本，有87.1%的人回答说他们除了专职工作之外，业余有兼工，而中辛口村回答有兼工的是26.8%，下辛口村只有19.3%的人回答有兼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调查发现，上辛口村的劳动力务工比例较高，工人下班后多半要经营自家的园田和做家务劳动；而中、下两村的耕地全部承包到户，劳动力把全部时间用在田间，做完农活之后或因没有时间，或因没有门路，所以无法兼工。这一点我们从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可以得到证实。当我们问

表 2 辛口村劳动力的工农业分布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

项 目	上 辛 口		中 辛 口		下 辛 口	
	人 数	比 率	人 数	比 率	人 数	比 率
劳力总数	580	100.0	1,017	100.0	231	100.0
农业劳力	164	28.3	787	77.4	111	48.1
工业劳力	416	71.7	230	22.6	120	51.9
农业潜在剩余劳力比重	59.8		63.3		41.1	
工业吸收后的差额率	-11.9		+37.7		-10.8	

表 3 辛口村劳动力业余兼工情况及未兼工理由 (%)

兼 工 情 况	上 辛 口	中 辛 口	下 辛 口	总 计
调查样本数	527	559	218	1304
有兼工	87.1	26.8	19.3	49.9
说不清	1.1	9.5	5.0	5.4
无兼工	11.8	63.7	75.7	44.7
无兼工理由:				
没时间	98.3	39.7	25.1	41.2
没门路	0.0	44.2	6.6	30.1
没必要	1.7	16.1	68.3	28.6
样本数	58	403	167	628

到没有兼工的原因时，上辛口村不兼工的劳动力98.3%回答“没有时间”，中辛口村有44.2%的人回答说“没有门路”，而下辛口村有68.3%的人回答说“没有必要”。这说明中辛口村在未充分发展村办企业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无出路；下辛口村的企业已足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下的务农的劳动力已充分利用。这样的理解虽然和经验相吻合，但仍然有待于对家户及劳动力的调查资料结合起来作多元分析之后才能肯定。下面进一步分析家户的收入构成。按人均总产值计算，上、中、下三村的排列顺序是上辛口、下辛口、中辛口；而家户的实际平均收入的顺序，从高到低的排列，则是下辛口、上辛口、中辛口（2 895元，2 580元，1 789元）。这样的差异只能用上辛口村的公共积累和集体生产再投资的比例相对较高来解释。另外从收入构成上看，下辛口村的收入虽高，但来自农业收入的比重（54.0%）与中辛口村很接近（56.2%），只有上辛口村的家户收入已经不以农业为主，农业收入只占25.9%，3/4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生产。因此可以说“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在上辛口村已基本落实。相对来讲，中、下两村的产值和收入虽有提高，但到1985年仍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农业生产，“离土”的程度仍是有限的。

2. 经营管理及再投资。我们已知辛口三村发展存在差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上辛口村发展得较快呢？从前面分析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及人口家庭结构方面得不到解释。我们调查发现，上辛口村的经营管理方式与其余两村不同，它在1983年就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把农村中的经济活动与党政工作分开，公司管理工农业生产，全村的生资料及公积金归公司所有，承包给各工厂、农场和作业队去经营。他们有相对的经营自主权，公司不能无偿平调。各工厂和作业队经营的好坏和该单位职工的收入挂起钩来，一些厂长在上任时就明确了奋斗

目标。这种管理体制，不同于过去的“大锅饭”，也不同于现在的“专业户”，它是向现代经济组织转变的初级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既有利于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参与水平，又有利于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促进生产力较快的发展。

农村改革是否彻底，不能只看是否实行了“包产到户”，而是要看是否采取了最适合生产力水平的责任制形式。上辛口村一直没有完全实行包产到户，村集体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始终在领导着全村的生活动。它在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乡村工业，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也许是上辛口村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观点也可以从江苏南部的农村发展和天津市静海县大丘庄的经验中得到印证。

经营管理最重要的一环是资金的运用。我们根据村委会报告的集体生产投资及家户调查所得的家户生产性开支作了一个比较。首先看家户开支：上辛口村因企业增加、产业结构变化，家户在1985年有生产开支的只有51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8%；中辛口村269户有生产开支，占全村总户数的69%；下辛口村11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3.7%。与家户生产开支的情况相反，上辛口村的集体投资65万元，与家户的生产开支总额成13比1；中辛口村的集体投资12.66万元，与家户生产开支为0.76比1；下辛口村投资6万元，与家户生产开支为0.65比1。显然上辛口村的集体投资远远超过家户的投资，且中、下两村正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承包到户造成的。

表4进一步确定了这个推测。若把家户生产性开支金额与各家户的农业劳动力人数(X_1)及工业劳动力人数(X_2)作回归分析，并以区分变量(Dummy Variable)的方法来区分3村的系数差异，则可以明显地看出，每户农业劳动力的人数是生产性开支增加的主要因素。以中辛口村每户农业劳动力与家户生产性开支的相关系数203.22元为基准，则上辛口村每增加一个农业劳动力，就增加家户生产性开支117.59元；下辛口村每增加一个农业劳动力，便增加家户生产性开支260.63元，上面三个因素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即 $P < 0.05$)。

表4 辛口村家户劳力与生产开支的回归模型

变 项	回 归 系 数	(标准误差)
平均系数(a)	96.72	(58.98)
户农业劳力数(x_1)	203.22	(27.41)**
户工业劳力数(x_2)	52.31	(33.64)
上辛口村(D_1)	-32.24	(89.72)
下辛口村(D_2)	-83.42	(108.85)
上村农劳力(D_1x_1)	117.59	(50.97)*
下村农劳力(D_2x_1)	260.63	(53.40)**
上村工劳力(D_1x_2)	-83.49	(46.41)
下村工劳力(D_2x_2)	45.08	(53.38)

* $p < 0.05$ ** $p < 0.01$ $R^2 = 0.275^{**}$

从表4数据可以推导出3村家户生产性开支余额与工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回归模式：

	家户生产性开支(\hat{y}) (-工-农户)	平均系数 (a)	农业劳力数(x_1) (b_1)	工业劳力数(x_2) (b_2)
上	354.11	64.48	320.81	-31.18
中	352.25	96.72	203.22	52.31
下	574.54	13.30	463.85	97.39

上辛口村的工业劳动力对于家户的生产性开支有负向影响,每增加一个工业劳动力,则会使家户生产性开支减少3.18元,工业劳动力越多,则家户生产性开支越少。但由于3村的家户收入已有差别,所以上辛口村有生产开支的农户虽少,其平均开支水平仍超出中辛口村。

与前面一致,下辛口村的家户收入最高,而且主要来自农业收入,所以该村以家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投资也是最高的。从前面的回归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就一工一农的典型户或农业劳动力的相关系数来说,下辛口村都是最高的。但由于辛口3村都实行集体经营与家户经营并行的制度,所以家户的生产投资并不能说明全村的生活动水平,这点应特别加以说明。

四、辛口村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收入的增长,会不会带来家户之间,尤其是从事工业和从事农业的家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按照工农业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个一般规律来说,这是可能的。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是否也按此规律发展?这是本节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另外,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农业向农村多元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引起农村的消费结构和方式以及农民的价值观念向着现代化转变?这是本节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1. 工、农业劳动与家户收入及生活开支的关系。首先,我们把每个家户的劳动力分为务农与务工两类(X_1, X_2)。上、中、下辛口村以分类变项来区别,以中辛口村为基数,上辛口村为 D_1 ,下辛口村为 D_2 ,然后与家户收入联系起来作回归分析,以此来考察农业劳动力与工业劳动力对家户收入的影响有无统计上的显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总的说来,家户收入高低与家户中的工、农劳动力人数是有显著相关的, $R^2=0.56$,就是说56%的家户收入可以用上述变项的回归系数来说明。得到这么高的回归系数,回归模式是可信的。同时,分村区别务工与务农劳动力对家户收入的影响。即 $D_1X_1, D_2X_1, D_1X_2, D_2X_2$ 的相关也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5$)。

以中辛口村为基数,我们发现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对家户收入的影响为641.2元,与每个工业劳动力的影响658.3元相比,差距甚微。而上、下两辛口村,尤其是下辛口村,务农劳动力的收入都超过务工劳动力。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将是难以理解的,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发生这种现象则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目前的中国农村,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业企业吸收之后,农业生产承包到户,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而且实行“以工补农”,集体用发展工业的收入为承包土地的农户无偿支付水、电、机耕等项费用,并代为缴纳农业税,这就减少了农户的开支,增加了收入。而工业产值虽高,投资也大,分配相对较少。另外在收入分配上有时也给务农劳动力以补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农业不致荒废。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才造成务农劳动力的收入高于务工劳动力的现象。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现象不能否定发展乡村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的吸引,如果没有乡村工业的发展,就不会出现务农劳动力收入的提高。从中辛口村工业不够发展,工农收入差距不大的实例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在上一节指出,家户生产性开支主要受务农劳动力人数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家户的非生产性的生活开支应当主要受务工人数的影响。从这个假设出发,我们作了工、农劳动力人数与家户生活开支的相关分析。

对家户生活开支(不包括盖房费用)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相关系数为0.38($R^2=0.38$),统计上也有显著性。从回归模式上看,工业劳动力对农户的生活开支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

力。上辛口村每增加一个工业劳动力，就增加609.98元的生活开支，而增加一个农业劳动力，只增加472.76元；中辛口村两者各为513.53元和298.28元；下辛口村是636.97元和556.21元。这个统计结果，验证了我们前面的假设。同时，我们也注意到3村之间生活开支的差别。下辛口村的农户收入最高，开支也最大；中辛口村的收入和开支都是最低的。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农户拥有现代化耐用消费品的情况。这是积累的消费，不能限于1985年一年之内。所得结果与农户生产开支的回归趋势是一致的，农户中工业劳动力人数对家庭拥有现代化消费品的数量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平均每增加一个工业劳动力，家庭中就增加0.91件耐用消费品，而增加一个农业劳动力，只增加0.20件，上辛口村尤为显著，只有下辛口村例外。

2. 现代化观念的提高。在劳动力抽样调查的问卷里，我们在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测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测量劳动力观念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指标，其中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参与水平，对下一代文化水平的期望，对本人工作的计划性及改进工作的要求，以及对男女在家庭中地位的看法等9项指标。总合统计值为9—27分，9分为最传统，27分为最现代化。

我们设定的自变项有性别、年龄和文化水平，在控制这些变项之后，再来观察务工与务农的差别对观念现代化有无影响。统计结果是男性较女性更现代化一些；中年人（30—49岁）比青年（16—29岁）和老年（60岁以上）更现代化；教育上的显著性表现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较现代化。可是这些个性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都是极有限的，都在1、2点数以下。从事工业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差别也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村与村之间的差别很大。以中辛口村为基准，上辛口村劳动力的观念现代化水平平均高出10.88个百分点。这个全村性的观念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许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假若如此，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人观念现代化的影响要大于个人因素，因此提高人们观念现代化水平，有赖于整个农村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

结 论

透过对辛口3村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作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

1. 中国的农村改革不会导致农民的两极分化。从1978年中共中央提出农村改革以来到1981年的3、4年间，在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学术界显然产生过对此一新政策理解上的困扰。争论的焦点是实施这一政策会不会导致农村的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个争论又和过去所谓“左”与右的路线之争联系在一起，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找根据，而没有实地调查的经验资料作验证，所以国外学者，如茨韦格（Zweig）认为这个争论直至1981年仍然停留在猜测阶段。我们的这个调查以实际资料证明，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后，虽然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没有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农村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2. 中国农村的发展应因地制宜，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村经过几年的发展，出现了所谓“苏南模式”（以乡村企业为主干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温州模式”（以农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模式并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各地农村对中央政策作出的不同反应。其实，实际的发展并不仅限于这两种模式，我们调查的上辛口和下辛口村的发展道路就不相同。中国农村如此之广阔，各地条件殊异，不应采取一个发展模式。在政策进一步放宽之后，各地可以采取最适合他们情况的发展道路。在农村改革中，不应当把集体经济和

个体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辛口3村既有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业方面），也有以农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种植蔬菜）。然而就北方农村而言，仍应以乡村集体经营的企业发展为主干，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上辛口村的发展经验给了我们这个启示。

3.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从“离土不离乡”逐渐转变为“离土又离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主要是发展乡村工业，就地实现职业转变，而不是进城就业。以辛口村为例，该村地处大城市郊区，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比内地农村要多，然而自1976—1985年的10年间，3村总共只有43人通过各种方式离乡进城，平均每年只有0.1%的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若以这样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则需大约233年的时间才能把辛口村目前测算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而辛口3村从1980—1985年的6年间，就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482人，上、下两辛口村已经吸收完毕，并有超额，中辛口村也以每年吸收总劳力5.68%的速度实现就地职业转变。所以我们认为只有靠发展乡村企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有农村的经济起飞。因此“离土不离乡”应是中国现阶段农村发展的基本方针。

然而“离土不离乡”只是过渡政策，从长远的发展看，将来势必既离土也离乡。原因是目前的乡村工业分散经营，重复建设，设备和技术落后，信息不灵，因此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一旦乡间企业唯一占优势的劳力资源失去优势，它就很难在市场上立住脚跟。此外它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污染都是不合算的。这些在目前阶段不可避免的缺点，在将来的发展中将会变成不能容忍的弊端。随着乡村工业的相对集中，必然会伴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对于这种将要出现的“离土又离乡”的发展趋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现在就应当预见并有所准备。

4. 中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近几年来中国乡村工业虽有较快的发展，但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是很大的。最大的困难是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可以说它们是在国家计划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因此从动力、原料到市场都要靠私下交往去获得。这种“走后门”“拉关系”的经营方式，显然不适应农村的普遍发展，而且会带来许多社会弊端。因此，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配合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5. 关键是人才。上辛口村以及中国其他地区许多农村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哪里有人才，哪里发展得就快。人才因素比其他资源更显得重要。然而目前的中国农村，确实是人才难得。他们只有农业生产的经验，缺少管理工商业的经验，这是乡村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建设的各类人才，应当列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计划，并采取切实措施付诸实施。

作者工作单位：李哲夫 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

杨心恒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李国庆